

明
庫文津間

津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种
主编 王振良

都市鏡像

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

李炜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開
庫文津間

津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种

主编 王振良

都市鏡像

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

李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镜像: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 / 李炜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10
(津沽文化研究集刊 / 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441-6

I. ①都… II. ①李… III. ①日本文学—近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31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7409 号

都市镜像: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

李炜 著

出版人 /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abc.net>

今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05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441-6

定 价:38.00 元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14DB083)阶段性成果,天津市问津书院问津学术奖励基金资助出版项目

序 言

王向远

大约在十年前，我开始鼓励擅长日语的博士生们围绕中国城市空间进行日本“涉外文学”的研究，具体选题有《日本文学与北京》《日本文学与大连》《日本文学与西安》《日本文学与天津》《日本文学与哈尔滨》等。经过几届博士生的努力，上述选题先后落实，并且都有了可喜的成果。获得博士学位后，专著的出版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等的立项捷报相继传来，这些都是对“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系列选题的最有力肯定。眼前这部《都市镜像：近代日本文学的天津书写》，就是李炜在其博士论文《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及其殖民生态》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常跟学生说，选题有两种：一种是好写的但写不好，一种是不好写的但可以写好。所谓“好写的”，指类似题目的先行研究较多，材料丰富，可以轻松地写出很多字数，却很难写出新意，要想有全面的创新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写不好”；所谓“不好写的”，是指该选题别人很少研究或无人研究，材料是原始性的，收集整理材

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写起来费时耗力。但这样的题目一旦写成,作者便能提出新鲜的思想见解,在学术界将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如若出版成书就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产品,能为读者展示新的知识领域。所以说可以“写好”。

以这样的观点来衡量,李炜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不好写”的题目。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可供参考的先行研究少之又少,与日本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北京书写”等相关研究硕果累累的情况截然不同,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研究仅有三四篇论文。其次面临的困难是“天津书写”原始资料难以搜寻。天津这座城市,虽然因拥有“天子之渡口”的特殊位置而被誉为“帝京之咽喉”,虽然因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被称为“华北第一商埠”,虽然因便利的交通位置成为来华日本游人的必经之地,却不是日本文学中的“宠儿”。以天津为舞台的日本文学作品,从数量上而言,不仅无法与古城西安或故都北京相比,与同为殖民地城市的大连及哈尔滨也不可相提并论。各种厚厚薄薄的《日本文学史》著作,对此类作品大都没有涉及和评述。因此,在动手准备的头一年,资料的收集,尤其是文学文本的收集进展缓慢,甚至能不能写下去似乎都成了问题。其间,我与李炜多次面谈交流,曾对她说:近代天津与日本有深刻的关联,当年日本人把天津原有的地名都改成日本式的了,按照日本人喜欢记录与写作的习惯,关于天津的记事、描写肯定有,而且肯定不会少,只是收集材料的思路与方法要加以转换,未必都从“天津”这个关键词入手,未必只盯住名家名作与纯文学,未必只重视单纯写天津的作品,写华北、写北京而旁及天津的,也要纳入视野。这样的作品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纯文学的价值,它们的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那些纯文学、纯历史著作所不可替代的……就

这样,终于柳暗花明,洞天别开,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推进,论文写作也顺利起来。

现在看来,尽管在细节上尚有众多未尽之处,李炜却将这个“不好写”的题目“写好”了。她将研究视角扩大到报刊报道、随军纪行文、军事小说、恋爱小说、游记、散文、随笔、回忆录等各类文献,挖掘出了田冈岭云、江见水荫、内藤湖南、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金子光晴、森三千代、尾崎士郎、吉川英治、杉山平助、吉屋信子、大田洋子等多位文人的“天津书写”,可以说对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时性研究。而要将这些长久以来被学术界“忽视”的素材重新挖掘出来并进行系统整理的艰辛可想而知。

此书是李炜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却并不完全等同于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李炜又对论文进行了精心修改,坚守“小题大做”及“深挖细究”的原则,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论述及分析,并将修改后的章节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在各类期刊上。陆续发表的论文包括《论金子光晴笔下的天津》(载《东北亚外语研究》)、《天津旅行与“支那趣味”——论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载《山东社会科学》)、《选择性失忆:论大田洋子的〈樱之国〉》(载《日本问题研究》)、《寻求“弃作”中的“记忆”——以森三千代的《曙街》为中心》(载《外国文学评论》)等。到目前为止,博士论文的绝大部分章节都已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部专著公开出版,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当初李炜在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开始就告诉她:你是在职攻读,三年也行,四年也行,甚至五年也行,前提是一一定要把论文

写好再毕业答辩,不必着急。事实上,她确实没有着急,当然也不是慢慢腾腾完全不着急。但不管怎样,她只用了三年,就做到了上述的一切。在这三年里,作为主妇她有必须做的家务,作为老师她有必须做的教务。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博士生,她必须来修学分上课,必须用大量时间写论文。而这一切,她都做得很好。即便不是从容不迫,也是有板有眼。这除了她的用功,还有她的基础。在此之前,李炜写文章并不多,但作为一个有成绩的翻译者,翻译出版了各类日文作品达数百万字。我曾说过,对于阅读与接受而言,没有比动手翻译更有效了,翻译是研究的基础,一个人若能经由百万字以上的翻译,既能锤炼中文,又能提高外文,更能锻炼思维。李炜成功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来,我跟李炜说,出书也不必着急,等相关章节全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再出书不迟。但现在正好赶上一个机会,天津的问津书院正编一套关于天津研究的丛书,编者对这个选题很有兴趣。能列入对路的丛书出版,当然会有更好的效应,因此我完全赞成。这也表明,李炜的这个选题,不仅是日本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日文学关系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而且作为近代天津研究的成果,也有其独创性及开拓性。

2016年8月28日于北京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方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

绪 论

“都市书写”在文学中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既是展开各类故事的舞台,同时也是被着重表现的对象;既是影响形式表现及主题表述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被单独称作一类文学题材。因此,近年来日本文学中的都市书写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时至今日,日本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北京书写”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学术专著及论文。而与之相比,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长久以来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地位。但天津绝非日本文学中的“缺席者”,特别是近代以来,报刊报道、随军纪行文、军事小说、恋爱小说、游记、散文、随笔、回忆录中都能看到天津的身影。具体到文本作家,不仅有田冈岭云、江见水荫、内藤湖南、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金子光晴、森三千代、尾崎士郎、吉川英治、杉山平助、吉屋信子、大田洋子等所谓“名人”,也有各类随军记者、来津游客、天津日侨等“非名人”。他们的作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天津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是一座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文化沉淀的城市，许多地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岁月印记和精神遗存，其本土文化中更是浸透着外来殖民统治的历史与文化。而日本，在天津的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但又绝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说近代天津历史上的每一步前行都有着无法抹去的日本殖民阴影，具体而言，日本在天津的侵略殖民活动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津殖民活动起步较早。因天津在地理上与北京呈犄角之势，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把天津当成“帝京之咽喉”，早在1875年9月就在天津设立了领事馆，1898年划定日租界，1900年开始在天津驻军，1907年成立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制度完善设施齐全的“小日本”。二、天津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缩影。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天津曾遭到列强的五次入侵，城池三度陷落，到了20世纪初，更有九国租界一起矗立于海河两岸。因此，与在台湾、大连等殖民地的“一统天下”的情况不同，日本在天津的殖民活动不只涉及中日两国，同时涉及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日本的侵华过程中，天津舞台上时刻上演着日本与西方列强时而妥协、时而联手、时而争斗的场面。三、能够体现日本在华殖民势力演变的全过程。日本在天津的殖民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部分到全部、从全部到“全无”的发展及变化过程，这也从一个侧面清晰体现了日本对华侵略所经历的蓄势待发期、暴露膨胀期、迅速发展期、急速消亡期等各个不同时期在华势力的兴衰与起伏。

正是由于天津具有上述中国其他殖民地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特点,使得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在日本侵华史、日本殖民文学书写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这些天津书写,就像一面面镜子,能够让我们清晰看到在日本殖民主义阴影笼罩下的世间百态。因此,本书将以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为依托,通过论述近代以来日本在天津呈现出的“殖民生态”,揭示不同时期日本人的殖民文化及好战心理,从崭新的角度论证日本侵华的史实。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殖民生态”是笔者在本书中的“创新词汇”,但笔者在此并无哗众取宠之意,只是认为与现有词汇相比,“殖民生态”更能全面概括本书的研究内容。在解释何为“殖民生态”之前,要先明确“殖民”的含义。日本出版的各类辞典上对其解释大致相同,如《大辞泉》的解释是“某国的国民或团体,移居或定居到与本国处于从属关系的区域进行经济活动或开拓活动”^①。《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是“使本国人民移居或定居在本国之外的新领土或未开发土地上,进行土地开拓或经济活动”^②。由此可以看出,“殖民”与“移民”最大的不同在于移居的区域与本国处于从属关系或者属于本国的土地。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论是军事入侵、经济掠夺还是文化侵略,其最终目标就是希望长期占领中国,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至于“生态”一词,按照《广辞苑》上的解释,主要具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广泛指称各种生物的个体、群体、生活集团的生存样式,如“昆虫的生态”;另外,用来比喻社会生活中原本本的生活状态,如“年轻人的生态”^③。本研究中的“生态”则选

①松村明编:《大辞泉》,东京:小学馆,1995年,第1341页。

②日本大辞典刊行会编:《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五卷,东京:小学馆,第1372页。

③新村出编:《广辞苑》第五版,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1473页。

取上述的第二层意思。因此本书所涉“殖民生态”，笼统地讲就是指殖民者在殖民地空间内的真实生活状态，其涵盖范围广泛，能够将以往常用的“殖民统治”“殖民空间”“殖民心理”“殖民主义”“殖民视角”“殖民生活”等全部包容在内。

从感性的角度细致记录当时在华日本人生活状态的文学文本，能够较为全面真实地展现出日本人的殖民生态。尽管日本作家的描写会在一定程度上避重就轻，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进行粉饰或遮掩，但透过这些被部分歪曲的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清晰看到近代以来日本人对华持有的殖民野心、对中国人具有的殖民文化优越感、以及总以救世主自居来掩盖其侵略、掠夺、剥削、压迫本质的“惯用伎俩”等等。这样既可以弥补一般近代史研究中重视史料而忽视或不太顾及“文学”性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弥补一般文学研究过分注重作品审美价值而相对忽略历史文化价值的缺憾。

此外还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何为“文学”？借用日本《广辞苑》的解释，只要以语言为工具的能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本都应该视作文学文本^①，也就是说，除了诗歌、小说等纯文学体裁，新闻报道、报告文学、随军记、游记等都应该归入“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文学”自发生之时实际上就是指广义的文学，“文”与“学”不分，“文”“史”“哲”等概念并不明确。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文学文本中，既有感怀于异国风情的诗作，也有将背景设置于天津的小说；既有移步换景的精彩游记，也有真实记录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既有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留下的史料，也有对“故乡”抱有无限怀念之情的

①新村出编：《广辞苑》第五版，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2381页。

回忆录。而游记、回忆录之类的作品恰恰具有某些“纯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历史文献学价值、社会心理学价值、文化学价值、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价值。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选取的文学文本将时间(指文本内的背景时间,而非出版时间)限定在了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间。

对日本文学中天津书写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如下三点意义:一、首次对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时性研究,本书引用并翻译了大量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涉及天津书写的文献,其中大部分为笔者首次翻译,这将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更多崭新的文献资料。二、与众多旨在从还原史实的角度研究侵华过程的史学研究不同,本书尝试从文学文本出发,讨论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对华心态及其在现实层面参与殖民活动的路径,揭示日本在华殖民生态的发生、发展、衍变的过程。三、首次将“日本文学”“天津书写”“殖民生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论证,将文学研究与时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将文学研究与国耻、国难教育密切联系起来,能够填补日本文学研究及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日本文学与中国及中国都市空间研究

在“日本文学中的中国”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凭借语言、文化优势进行的相关研究颇具特色。如松村定孝、红野敏郎等编著《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像》(有斐阁,1975年)、竹内实的《对日本人而言的中国像》(春秋社,1966年)、川西政明的《我的梦幻之国》(讲

谈社,1996年)、西原大辅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等。特别是西原大辅的博士论文中译本刊行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框架介入中国题材大正文学史的研究颇有新意,对笔者而言极具参考价值。

中国学者近年来在“日本文学中的中国”研究方面也是成果频出,如李雁南的博士论文《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暨南大学,2005年),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形象学理论的关照下解读了“中国”这个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他者形象,以时间为线索,以典型文本为依据,勾勒出了中国形象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衍变史。陈云哲的博士论文《跨界的想象与无界的书写: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将“中国形象”“中国情趣”与“东方主义”看作是具有同构性的整体,以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游记文本为研究对象,研究两位作家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的本质差异性。这两部博士论文都以日本近代文学文本为主,研究的是“断代的”“剖面的”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重要的期刊论文有徐静波的《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研究:兼论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观》(《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2期)、孙立春《从〈中国游记〉试论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话语》(《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苏明《“诗意”的幻灭:中国游记与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之建立》(《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王奕红《日本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新宿分子〉中形塑者的“第四种态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鲍同、姜毅然《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大地之子〉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3期)、钱昕怡《“国亡生活在”——

长谷川如是闲的《中国游记及其中国观》(《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既有日本近代游记文本,也有日本现当代文学文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日本文学中体现出的中国观及中国形象。

在“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空间研究”方面,“魔都”上海较早得到了中日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阐释。由于相关论文数量众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单是以广阔的视野来论述上海城市空间与日本知识分子关系的重要著作就有和田博文的《言语都市:上海1840—1945》(藤原书店,1999年)、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讲谈社,2000年)、赵梦云的《上海·文学残像:日本作家的光与影》(田畑书店,2000年)等。其中刘建辉的《魔都上海》,以开阔的“大文化”视野,将记者、作家、出版业者、西学志士等统统纳入考察范围,从对日本知识分子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出东亚的“最前线”——上海的体验与感悟作实证分析,不仅揭示了日本近代化启动的国际文化背景,同时也为人们探讨近代中国的衰败过程提示了社会文化解析的路径。因此,他的研究既属于文学的,也属于历史和社会的,很难将其归入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范畴,这一宏阔视野的择取对笔者颇具启发性,同时也佐证了“日本文学与天津”研究的可能性。与之相比,赵梦云的《上海·文学残像:日本作家的光与影》则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文学”,围绕田冈岭云、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等六位作家,以及他们以上海为舞台创作的文学作品,探讨了近代日本作家的民族意识、文化传统及其对上海的认识。

再来看日本文学中的北京书写研究。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学者已积累了数量众多的单篇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成果有:藤井省三的《芥川龙之介的北京体验——短篇小说〈湖南的

扇》和佐藤春夫《女诚扇绮谭》》(载《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竹松良明的《〈北京〉与〈绿衣〉——关于其质的差异》(载《阿部知二论——“主知”的光芒》,双文社,2006年)等。中国学者的成果主要有:单援朝的《芥川龙之介与胡适》(《语言与文艺》,1991年8月号)、王成的《林语堂与阿部知二的〈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及《旅行与文学——阿部知二的中国旅行与文学叙述》(《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5期)、秦刚的《芥川龙之介看到的1921·乡愁的北京》(《人民中国》,2007年第9期)等。可以说,在具体的作家论及作品论层面,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及阿部知二的长篇小说《北京》是中日学界关注的焦点,上述各研究多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以北京为背景的创作进行了全景式的探讨。

王升远的博士论文《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通过对日本文化人笔下北京天桥及苦力形象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萨义德理论的“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之构造与原理。另外,通过日本文化人的北京知识分子题材创作,讨论了战时文化语境下中日文化人的思想纠葛及文化政治心态。其论文的部分章节已陆续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与日本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北京书写”研究硕果累累枝繁叶茂的现状相比,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研究就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苗,尚处于起步阶段。就笔者视野所及,仅发现如下四篇论文:陈淑梅《文学者看到的近代中国(一)——金子光晴和天津》(《明治大学日本文学研究会》,1996年6月);石崎等《租借地天

津曙街》(《立教大学日本文学》93号,2004年12月);姚红《1921年芥川龙之介的天津之旅》(王晓平:《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赵怡《金子夫妇的北方之旅》(上垣外宪一:《一九三〇年代东亚的文化交流》,思文阁出版,2013年)。除了姚红的论文涉及了芥川龙之介,其他三篇论文皆围绕金子光晴与森三千代夫妇的天津书写展开,而近代以来的其他各类天津书写,迄今为止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二)日本文学与日本侵华史的交叉研究

在文学与日本侵略史的交叉研究方面,日本学者起步较早,出版了多部研究战时体制下日本文学状况的学术著作,如吉本隆明、武井昭夫的《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淡路书房,1956年)、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劲草书房,1971年)、都筑久义的《战争体制下的文学家》(笠间书院,1976年)、樱本富雄的《文化人的大东亚战争——PK部队在前行》(青木书店,1993年)等。上述日本学者能够正视历史事实,从文学者在战争时期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态度出发,探讨了文学者在整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应负的责任,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在中国国内,王向远教授是率先从“侵华文学”这一独特的切入点对日本侵华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其著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于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马上引起了学术界及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该书首先论述了日本侵华国策的思想根源以及其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具体体现,然后分章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为东北殖民统治秩序服务的“满洲文学”及“开拓文学”,七七事变后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笔部队”的侵华文学,并对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恶劣影响的文学现象作了专题研究。该书囊